

苏联史学理论

陈启能 于 沛 黄立第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97221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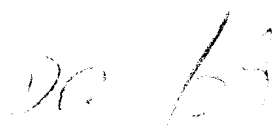
苏联史学理论

陈启能 于 沛 黄立第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新慧
技术设计 王宇航
责任校对 孟赤平



苏联史学理论

陈启能 于 沛 黄立弗 著

出版：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新街口六条红园胡同 8 号 邮编：100035)

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总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通县张家湾曙光印刷装订厂

787×1092 毫米 1/32 10.25 印张 225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80118-256-1/F·249

定价：16.8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邮编：100836)

专家推荐意见书（一）

推荐人：刘家和

推存时间：1995 年 6 月 30 日

阅读书稿后，我愿意郑重推荐此书出版希望给予资助。理由如下：

一、本书的出版是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从学术意义上说，苏联史学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即有成就，又有失误，很值得认真总结。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经验教训，都是一笔宝贵的极有价值的理论遗产。苏联史学理论本身也是如此，同样值得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我们不能像国外（包括前苏联）不少人所采取的轻率的虚无主义态度，对苏联的一切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以为苏联解体了，苏联的一切（包括其史学和史学理论）就毫无价值，根本不值得去研究，这种不科学的态度显然不可取，从现实意义上说，中国史学曾深受苏联史学的影响，不能说这种影响至今已不存在。因此，认真总结和研究苏联的史学发展和史学理论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有借鉴和参考价值的。

二、本书作者是长期从事苏联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学者，对所研究的对象十分熟悉。据悉，他们从事这项研究历时八载，收集了大量资料，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因此这是一部认真严肃的经过扎实研究的作品。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对材料的加工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样的著作在我国是第一部，同西方和前苏联学者比较也有自己的特色。据我了解，不论西方还是前苏联，像这样系统评介苏联史学理论的著作也未见到。

三、本书所用资料全部是第一手的外文资料，这就保证了本书的学术性。资料的翔实和丰富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理论的深度和分析的周到是另一特色。同时作者努力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解释理论问题使读者易于接受，这也是本书的又一特色。

刘家和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1995年6月30日

专家推荐意见书（二）

推荐人：何兆武

推荐时间：1995 年 6 月 27 日

苏联史学的发展有过 70 多年的历史，富有它自身的特点，曾对世界史学界、尤其对我国史学界有过很深的影响。苏联这个国家虽已解体，但苏联史学和史学理论的传统和影响并不随之而消灭。它不仅表现在今天的俄国史学中，而且对世界史学发展的影响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因而对苏联史学作出科学的总结，对苏联史学理论作出认真的探讨和系统的评论，应该是目前史学界一桩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工作。过去我国史学界在这方面做过一点工作，但较为零散、不够深入。本书（《苏联史学理论》）的完成和问世，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

本书，包括如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苏联史学理论 70 多年的发展，作了一番全面的理论的和历史的总结。作者充分利用了前苏联史学家在这方面的许多重要成果，可以有助于读者了解当前俄国史学界的理论探索情况和思想动向。俄国史学界不但揭示了过去所不大为人理解的事实情况，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见解。作者在论述时，也做出了自己的评价。第二部分系统地评述了苏联史学界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其中涉及许多带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如历史认识中的

主体和客体，历史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历史事实”的概念，可能性与现实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等。作者不但有深入的介绍，而且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第三部分着重评述了苏联史学成就较为显著的计量史学和比较方法。作者对这方面的系统评述，对我国当前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

本书，是一部很有质量的学术研究专著，资料翔实可靠，内容系统充实，论述严谨精确。作者对于苏联史学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内容和特点，作了较全面的理论概括，对其中所涉及的其他各门学科的问题，能结合苏联史学理论研究的实践进行深入的分析，实事求是，深入浅出，很好地突出了苏联史学理论中具有特色的理论化与跨学科整体化研究的方向。应该认为本书是我国当前史学研究中一项有价值的成果。

有鉴于此，我谨郑重推荐此书，希望能资助出版。

何兆武

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

1995年6月27日

前 言

一位俄国历史学家在回顾他的国家的历史学在本世纪的发展时，不无感慨地说：“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国的史学有两次不能哪怕在某种程度上预见那从根本上震撼国家的戏剧性事件：不论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俄国自由主义史学……，还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武装的苏联历史科学，都不能预见那些导致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根本改变、甚至国家面貌本身根本改变的事件的发展。”^① 这里撇开不说俄国自由主义史学不能预见 1917 年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二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制度的十月革命这个问题，它同本书的关系不大。需要简单说一下的是后一个问题，即苏联历史科学不能预见 1991 年底苏联解体的问题。

一般说来，不能认为历史科学根本不可能具有预言功能，连前面提到的那位俄国历史学家也不否认这点。^② 自然，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诸如历史科学何以具有预言功能，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预言功能等问题，都需要专门研究，这里不便赘言。一般说来，一种历史科学如果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应起的功能，那它的运作机制中总有什么地方出了故障，总

^① Б. Г. 莫吉利尼茨基：《我国史学中方法论研究的某些结论和前景》，载俄国《近现代史》杂志，1993 年第 3 期，第 18 页。

^② 同上，第 19 页。

不能说它的状况是很完美的。比起历史科学的其他功能来，预言功能也许有些特殊，因为要准确地预言未来发生的事难度本来就很大，更何况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过去。因而单凭预言功能没有发挥好这一点来判断历史科学的状况是根据不足的。我们当然也不能单凭这一点来判断苏联历史科学。

不过，苏联历史科学的确存在着许多问题。简单说来，在80年代中期以前，它似乎总是处在一种盲目乐观、自吹自擂的状态中，总是跟随在苏联党和政府不断宣扬“形势大好、成绩巨大、前景光明”的调子后面，如数家珍般地历数自己各方面的成就，并对未来作出种种乐观的预言，缺点和不足只是给予很次要的地位。这种过分乐观的情绪，一旦遇到剧变，立刻就变得措手不及、惊慌失措，继而就转到另一极端，变成全盘否定、一片“深刻危机”声了。苏联历史科学不仅被摘掉顶顶桂冠，而且变得似乎一无是处，甚至“罪大恶极”的了。

苏联历史科学在80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遇到巨大的冲击。当时，苏联党政主要领导人在“改革”的旗号下，提出“公开性”、“填补苏联历史‘空白点’”等口号，很快在全国形成了一股“历史热”。这股“历史热”的主旨无非是：过去历史书籍掩盖了真相，告诉人们的都是谎言，因此全部历史都要重写。一时间，“历史”成了全社会最热门的话题。有两位俄国历史学家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作了如下一针见血的描述：“这是多么令人奇怪的时代。所有的人都成了历史学家。我们有多么努力地在填补历史的‘空白点’，以致都没有觉察到，如何在一个美妙的瞬间，不仅历史没有了‘空白点’，连历史本身也不存在了。”“简单化的历史解释，比偷盗还要坏。我们七十年的历史被严厉的诅咒这个磨盘几乎已磨成齑粉。

它是不可理解的，被骂得体无完肤，但从我们每一个人的手势、语言、行为中可以显现出来——它被推倒了，但没有根除。”^①

显然，处于这种状态的历史学，自身尚且难保，又何以去谈什么预见哪怕是眼前发生的事变的发展。所谓“自身难保”，并不是说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和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历史学家队伍已不再存在或很难存在，已濒临断绝的边缘，而是说作为任何一门学科的生命独立存在价值或独立性，这时对苏联历史科学来讲已所剩无几，历史学已几乎完全沦为政治潮流的工具。如果说，苏联历史科学长期以来一直受政治干涉的困扰而备受折磨的话，那末在 80 年代中期进入“改革与新思维”的时期以后，情况似乎并无根本的改善，而且在“历史热”浪潮的推动下，甚至有恶性的发展。这种状况在苏联解体以后，总的说来仍在延续。唯一的不同是：如果说过去对苏联历史和苏联历史学是一片赞扬声的话，那末现在则是一片咒骂声。毫无疑问，过分的肯定和过分的否定，离真理和科学性是同样的遥远。事物毕竟不是黑白两色。历史科学必须根据事实作出判断，不能顺着政治潮流随波逐流，只在两种颜色之间进行选择。上述两位俄国历史学家在 1991 年时写道：“而目前历史学家面临的是并不简单的任务：保住自己的职业自主，捍卫不久前刚刚获得的而又重新受到政治潮流威胁、有可能丧失的独立性。”^② 他们表示相信，社会最终会向历史学家要求提供知识，而不是政治争论和纷争中的论

^① Г. А. 博尔久戈夫、В. А. 科兹洛夫：《史学与时潮》，莫斯科 1992 年，第 3—4 页。

^② 同上，第 5 页。

据。“这样的时候终究是会来到的。”^①

平心而论，在苏联，不论在任何时候，在斯大林时期的高压下，在“历史热”的汹涌浪潮中，在苏联解体后的一片否定声中，都不乏有头脑清醒、并不随波逐流的历史学家。更应看到的是，不论在任何时候，广大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忠于自己的职业，总是默默地在史学的田地中耕耘，作出自己的奉献。尽管他们受到时代的局限、条件的限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然而他们的成绩是不能抹杀的，尤其是在各种各样的具体历史领域和历史课题方面。唯其如此，苏联历史科学才不应该简单地一笔抹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既看到它存在的严重的问题，又承认它取得的巨大的成绩。而且，不论是问题，还是成绩，对后人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关键是要以正确的科学的态度，从今天的新的历史高度，对苏联历史科学的发展全过程，重新进行审视，进行总结，进行反思。一般说来，这样的工作做得越深入、越系统、越全面，收获必然也就越大。然而，这事说起来容易，实际做起来困难却很大。

这就具体涉及到本书的写作。本书是“七五”国家重点课题规划中的一个项目，立项是在1986年。原计划比较庞大，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苏联历史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二是苏联历史科学本身的理论问题，包括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此外，还加上对苏联历史科学和史学理论发展过程的回顾和总结。全书原定于1991年完稿。在全书初稿大体就绪的情况下，由于苏联本身的剧变和解体，完全打乱了书稿的进程和原定计划，不仅使书稿延至1994年才基本完成，而且

^① Г. А. 博尔久戈夫、В. А. 科兹洛夫：《史学与时潮》，第5页。

极大地改变了原定的内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发生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苏联这个存在了74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襁褓中时没有被14国干涉军所扼杀，在40年代时也没有被当时强大的法西斯德国所消灭，却在进入90年代时，在和平的环境中自我解体了。这就留给世人许多问号，迫使人们去思考：苏联在发展过程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终于导致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倒塌。也就是说，人们必须以批判的目光重新去审视、探讨、思考苏联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包括它的历史实践和历史理论。而这就需要有大量史料，尤其是新发掘的史料；同时也需要有时间，既需要有前苏联人们在头脑冷静以后进行认真反思的时间，也需要有局外人进行思考和研究的时间。

可以想见，这种原先预计不到的情况给我们课题组带来了多大的困难：原先完成的书稿必须从根本上加以修改，其中有很大部分基本上已无法再用。我们经过反复考虑的结果是：原稿中有一部分不能再用，必须放弃；另一部分必须适当修改增补；再有一部分要基本重写。不能再用的部分是有关苏联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这一部分早在苏联解体前就已引起很大的争论，所谓“填补历史的空白点”、“重写历史”、“恢复历史真相”，都是针对苏联历史过程说的。有关的新材料、新作品、新观点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同时新的史料也不断公布，许多档案纷纷解密开放。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哪怕是大体地弄清楚苏联历史过程的比较真实的情况，也绝非是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事，更何况是有关苏联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尽管重要，但在目前显然是无法做到的，因此我们断然决定：把这一部分放弃。

原稿基本可用、需要适当增补修改的，是有关苏联历史学的理论部分。具体来说，就是苏联的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部分。苏联的历史认识论研究，虽然起步较晚（战后 60 年代），却有其自身的特点，所研究的题目和西方不同，同时本身和苏联的政治潮流关系较远，因而受时势变动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对于这部分书稿基本可以保留，只需根据新的材料适当加以修改增补。

至于苏联的史学方法论，按照我们原先的设想，就是准备集中评述苏联史学中用新方法研究历史的新分支学科，而不准备评述其一般有关史学方法论的理论。因为在苏联，一般不用“史学理论”一词，自 60 年代起就用“史学方法论”（МЕТОД 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И）一词（或译“历史方法论”）。对这词的理解很广泛，其内容往往同历史认识论有重复，甚至也包括历史过程中的理论问题。这只要举出在苏联史学界一度影响较大的茹科夫著的《历史方法论大纲》一书作为例子就够了。在这本书中，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谈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的。^①另一方面，苏联史学中一些新方法的运用很有成绩，因此对这个方面加以评述显然是适宜的，不过，我们这次也作了一些调整，即集中评述其中最具有成就的计量史学和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尤其是计量史学。苏联计量史学取得的成就是公认的，在国际史坛也很有影响，即使在苏联解体以后对苏联史学的一片否定声中对苏联计量史学的成绩也是肯定的。

还有一部分需要基本重写的，即是对苏联史学和史学理论回顾和反思。原先根据苏联解体前的材料写成的有关苏

^① E. M. 茹科夫著，王瑾·译：《历史方法论大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

联史学和史学理论发展概况的书稿，基本上已不能用，必须重写。理由正如前面提到的，苏联解体这个事实本身使对苏联各方面的发展（包括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必须重新加以审视和反思。即使许多事实材料并没有变，也必须重新加以思考。我们需要了解今天俄国历史学家对这些事实的看法，了解他们经过反思后的想法，更何况还需要了解更多新的事实材料。坦率地说，今天要对苏联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比较实际和认真的总结，还是十分困难的，几乎是难以做到的，因为条件还不成熟。我们曾经考虑过把这一部分也放弃，但这样就会使本书显得不完整。缺乏对苏联史学和史学理论发展的大致了解，孤立地介绍苏联的历史认识论研究、计量史学和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就很难给读者一个哪怕是多少完整的印象。可是目前我们要独立地对苏联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总结性的概述，许多条件的确还不具备。好在近年来不少前苏联的历史学家发表了对苏联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进行反思的作品，其中大多是严肃认真的反思，不仅提出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和看法，而且可以帮助人们大致了解这一发展过程。尽管这些作品目前还不是全面的总结，但却可以帮助读者对苏联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及其中的重大问题有所了解。因而我们决定主要根据前苏联学者的这些反思作品，通过对他们观点的综述和评论，尽可能为苏联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概况提供一些线索。

这样，经过上述种种曲折之后，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前苏联学者对苏联史学发展的理论反思》，第二部分《历史认识论研究》，第三部分《计量史学与历史比较研究方法》。这样的内容，在字数上虽然比原定计划少了许多，但还是基本符合此书要求的。因为

按照我们的理解，“史学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史学理论，包括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和历史学本身的理论问题，我们原先的计划是按这种要求来做的。狭义的史学理论指历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包括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我们目前确定的此书内容基本上符合这个要求。因此，此书书名仍定为《苏联史学理论》。这是我们需要向读者说明的。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即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研究苏联史学理论还有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认为，回答是肯定的。今天研究苏联史学理论依然有其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兹简述理由如下。

首先，苏联历史科学存在七十多年，其间涌现过不少有造诣的学者和有影响的著作。苏联史学理论有其自身的特点，是苏联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史坛上，苏联史学也曾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苏联虽已解体，但苏联史学的影响远未消失，不仅对俄罗斯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史学发展是如此，而且远远越出前苏联的疆域。因此，作为重要的历史存在，苏联历史科学及史学理论本身就很值得研究。

其次，苏联历史科学和史学理论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其间既有巨大成就，又有严重问题。今天在它的历史已经终结以后，回过头来进行冷静、客观的审视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显然是很有意义的。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历史学的发展问题，而且从一个侧面多少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苏联的兴衰问题。苏联的兴衰自然有其复杂的原因，历史学并不是重要的侧面，但如果考虑到苏联对历史学的异乎寻常的重视，也就可以明白，这个侧面也并非是不可无的。这里只需指出，在苏联发展中的两个重大转折时期，

即 30 年代上半期和 80 年代下半期，苏联党和政府都是特别重视历史问题和历史学的。可以说，这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领域发生剧变继而导致整个社会变化的重要切入口。因而在研究苏联兴衰问题时似也不应忽视对其历史科学及史学理论发展变化的考察。

再次，在 50 年代时，苏联历史科学对我国历史学的发展曾经有过重要的影响，在这之前和之后也不能说就没有影响。对这种影响需要具体分析，既不宜估计过高，也不能漠然视之；既不宜全盘否定，也不能过多肯定。有一点是清楚的：加强对苏联历史科学和史学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分析这种影响。同时，对苏联史学成败得失的总结，对其经验教训的思考，显然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顺利发展是不无裨益的。

总而言之，对苏联历史学和史学理论的研究，是有其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同时，这也是一项艰巨的、需要长期努力的科研工作。本书仅仅是一个开端。

参加本书写作的有陈启能、于沛、黄立弗三人，分工如下：

陈启能执笔：前言、第一部分。

于沛执笔：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四章。

黄立弗执笔：第三部分第一、二、三章。

全书由陈启能通稿。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部分 前苏联学者对苏联史学发展的理论反思

第一章 对苏联史学的反思	(1)
一、对苏联史学的总估价	(1)
二、对史学指导思想的反思	(9)
第二章 对苏联史学理论的反思	(26)
一、对史学理论的理解	(26)
二、对史学理论发展过程的回顾	(34)
三、对苏联史学理论成就的回顾	(39)

第二部分 历史认识论研究

第一章 历史认识论—科学认识的理论	(45)
一、苏联社会科学中的认识论问题	(45)
二、苏联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问题	(56)
三、历史认识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63)